

周玉良 主持

贵州教育出版社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 贵州教育史

主编 孔令中



责任编辑：梁茂林  
封面设计：徐学康  
版面设计：田亚民



ISBN 7-80650-550-4



9 787806 505502

ISBN7-80650-550-4/G·323 定价：80.00元



# 贵州教育史

主 编 孔令中

常务主编 符康荣

副 主 编 古开伦 安永新

贵州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教育史/孔令中主编.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0650—550—4

I. 贵… II. 孔… III. 教育史—贵州省  
IV. G5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0243 号

## 贵州教育史

孔令中 主编

---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邮编 550004)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字数 27.5 印张 680 千字

印 数 1—3 620(册)

版次印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7—80650—550—4/G·323 定价:8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 电话:6784181—2127 邮编:550001

#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编委会

(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 名誉顾问  | 何东昌 | 邹时炎 | 杨海波 | 徐锡安 | 陶西平 |
| 顾问    | 王日新 | 王炳照 | 田正平 | 江 铭 | 郭福昌 |
|       | 黄定元 | 阎国华 | 潘懋元 |     |     |
| 主 编   | 周玉良 |     |     |     |     |
| 副 主 编 | 汤世雄 | 宋恩荣 |     |     |     |
| 编 委   | 王豫生 | 方 骏 | 冯象饮 | 齐红深 | 刘文璞 |
|       | 安效珍 | 李才栋 | 李定开 | 杨进发 | 张凤民 |
|       | 张 彬 | 陈乃林 | 陈光华 | 金汉杰 | 赵关忠 |
|       | 赵宝琪 | 俞启定 | 姜树卿 | 高 志 | 徐毅鹏 |
|       | 符康荣 | 傅九大 | 蒙荫昭 | 蔡寿福 | 熊贤君 |

# 《贵州教育史》编委会

顾 问 任吉麟 万方亮 金正宇

编辑委员会主任

孔令中

副 主 任 封孝伦 陈光文 蔡志君 霍健康 李小健

杨仁远 方仕平 李兴国 杨贵珠

编辑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碧海 邓厚勇 邓生井 代其平 朱 琴

许晓洲 刘祖辉 邹联克 何秀黔 邱富常

宋广强 杨正芳 杨尚连 杨凤林 张庆肃

张 华 陈方平 吴郁英 罗小平 罗志琳

周宝英 赵廷昌 润凤英 徐 迅 湛莉萍

黄 燕 银熙惠 龚 宁 鲁源安 管毓超

潘建春 潘真理

主 编 孔令中

常务主编 符康荣

副 主 编 古开伦 安永新

## 总 序

在这世纪更迭,千年转换的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奉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项目。本项目研究是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在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进行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统一规划,按行政区划组织力量开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关于地方教育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发展、兴盛的历程。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清除极“左”思潮干扰,端正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搜集整理积累资料,拓宽研究领域,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使中国教育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教育科学领域里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

从以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描述,多为汉族聚居,文化发达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历代居于政治中心地带的教育状况。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则较为注重京、沪、宁与东南一带新教育产生的地区。这种侧重,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这些地区一般来说代表了当时全国教育发展的水



平与主流。但是,过去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忽视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各民族教育交流融合的历史,因此还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如实地反映整个中国教育史的全貌。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延伸与加强,而不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单诠释或地区性缩微,应有新的发掘,新的创造。研究地方教育史,需对中国教育史的总体发展脉络有宏观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和历史特点、地域特色。其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它既要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性,更要揭示地方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命。紧紧抓住“地方”二字是这一研究的关键。

地方教育史是研究教育现象的空间与时间组合的学问。从广义上讲,它应归属于“地域文化”的研究范畴,是介于教育学与地理学、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研究地方教育史,自然会涉及到各地教育发生、发展与本地区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而对人们教育的模式、程度、内容与方法等,对民俗、民风,对人的气质、性格、品味、情趣的形成以及人才的数量与分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于这些,我国的古籍中早有所记载。自然环境同时也影响着一方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民居建筑,这些又都是教育的外部条件,间接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至于人文环境、社会结构对教育的影响,应当说更为直接,更为广泛。诸如区域历史文化变迁中经济的升沉消长,政治的争斗沿革,文化的滋生变异,民族的纷争融合,人口的增减流动,战争的起伏动荡等等,可以成为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制约条件,影响着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同时学派与学术思

想的地域性分布,更是直接作用于教育。如北宋、南宋时期的关学、洛学、濂学、闽学、婺学、陆学、湖湘学等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这些学派的相对集中与士人设学授徒传播教化,直接影响着当地的教育走向及其特点。

地方教育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地域文化的区域划分,可分为“机能文化区”与“形式文化区”。前者以行政区划中心的主导与协调功能为标志。后者以“具有某种文化特征或某种特殊人群的地域分布”,以历史文化功能为标志。从历史的视角看,以上两种空间的组合各成体系。对于一些地区来说,两种文化区的划分、归属互不对应,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又呈现为长期稳定的重合。

根据对各省区发现的 7000 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其后种种历史资料的考察,可以证明在公元前 6000 年至前 2000 年间的文明曙光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分散聚居的各个地区,已分别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性区域文化。如以渭、汾、洛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文化区,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区,以及辽东、辽西、燕山地区的燕辽文化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的华南文化区,黄河上游的甘青文化区,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等等。而且这些不同区域文化在漫长历史演进中或迁播扩大,或分化重组,又演变成新的文化区域。如后来的三秦文化区、齐鲁文化区、中州文化区、荆楚文化区、三晋文化区、燕赵文化区、关东文化区、吴越文化区、徽州文化区、巴蜀文化区、滇云文化区、黔贵文化区、八桂文化区、八闽文化区、岭南文化区、陇右文化区、草原文化区等等。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相互摩擦、交流、渗透、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总格局。这种种演变又直接影响到相互间的交通、人口迁徙,逐渐形成了长期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我们现在讨论的地方

教育史,是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范围的。今天的行政区划由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与相对稳定的文化系统演变而成。虽不完全对应于古代的历史文化区域,但文化的承袭与曾经所属的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追寻地方教育的历史轨迹所不能忽视的。

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避难、军队戍边、政治变乱、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曾经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和民族迁徙。这些都对文化的交流重组,教育的兴衰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例如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游牧民族入据中原,先后形成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大批中原人民的南迁,在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与中原文化。除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外,还有历代因罪而被贬谪的官员士人的零星流放迁移。他们中有许多谙习儒家经典的人才,南来之后无论著书立说,还是教学授徒,都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教育与文化习俗。如东汉末年,会稽大儒虞翻因直言获罪,被贬交州(含今广东、广西)。但他“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又如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又迁为柳州刺史。他雄心不减,兴建州学与孔庙,重振文教事业,不仅对湖南教育、广西教育,而且对其他地区的教育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近代来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迫使中国教育大规模西迁,使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蒙受了巨大的破坏,延缓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从另一方面讲,众多文化精英在短期内迅速地向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聚集,形成了战时内地文化教育中心。既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新思想、丰厚的人文精神充盈到这块偏僻的土地,又为战后教育与文化的复兴保存了民族的命脉。这些在抗战时期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的教育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

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为指导,在近年来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地方教育史的资料,对各地教育发展的历史加以科学地梳理与分析,实事求是地记述地方教育发展的史实,客观地分析与总结其特点与规律。通过研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教育发展的丰富而多样的全貌。通过这一研究,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与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

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多年来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以“地方教育”为研究对象,既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还需揭示历史本质,分析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评论利弊得失,作出价值判断。与地方教育志研究相比,地方教育史研究更多地体现出研究者的主体性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实证史学的方法,注重证据实证,重视逻辑,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并要不断地加强对新知识新方法的学习、借鉴与运用。只有这样,才可能追随学术的前沿,阐发历史的精义,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世纪转换与千年过渡时期立项、开题、研究、完成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试图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出时代的精神。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历史学的研究,都会深深地刻上时代的印记。历史科学的认识过程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时代精神都会在历史认识的观点、视野、视角、方法等方面得到及时的敏锐的反映。经历了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出了一些新的澄清,新的结论,新的认识,新的评判。过去那种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已得到很大改观,那种以“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卖国”

等简单化、表层化的评判方式,那种以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的治学模式,已逐渐被人们舍弃。当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日渐丰富充实,当中国越来越快地、越来越大幅度地走入世界,社会环境与社会心理都日渐发生变化,当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胸襟,去开拓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用更为客观、冷静、开放、包容的态度,更加高屋建瓴地来审视过往的历史。我们紧紧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努力在地方教育史的原野上开辟出一片片新的绿洲,结出累累果实。我们相信,通过展现地方教育史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貌与总体的认识。同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论调,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开展,可能会对人们认识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与借鉴。

一部部各具地方特色的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版,为整个中国教育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使我们认识到,忽视对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的记述与教育发展规律的总结是不完备的。中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统一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正是通过各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地方教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以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为参照系探寻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通过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不平衡性来进一步研究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二者间的相互比较与印证,将有助于更加科学、全面、深入、准确地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经验教训,更好地发展符合国情、省情、区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中华民族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教育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

高全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切切实实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有助于造就一代新人,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更加有力地推动 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总课题组

## 绪 论

---

考古学家在贵州发现的许多古人类的文化遗址表明,贵州是人类起源和中华远古文化发祥地之一。原始形态教育历史悠久;明代建省,确立封建教育制度;清代末年与中华民国时期,步入现代教育;抗日战争时期,教育激流勇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级党政领导及广大教育工作者,居位尽职,勤教薄薪,艰苦跋涉,为各级各类教育谱写了崭新篇章,培养培训了大量高、中、初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普遍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文化素质,有力地推动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

人民政府提出了“科教兴黔”的指导方针，贵州教育得到进一步健康、稳步地向前推进，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以后，贵州教育的办学条件有较大幅度改善，中、初等教育及职业教育稳步健康地向前推进，高等教育的招生数量和办学规模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成就斐然。

—

### (一) 贵州自然状况

贵州简称“黔”或“贵”，地处云贵高原东部斜坡。东邻湖南，南近广西，西接云南，北壤川渝。全省总面积 176167 平方千米，山地占 87%，丘陵占 10.5%。贵州地形复杂，群山蜿蜒，峰峦叠嶂，江河交错，岩溶密布。境内横亘大娄山、乌蒙山、苗岭和武陵山四大山脉，流淌着乌江、六冲河、清水江、赤水河、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等江河，出省后分别流入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贵州岩溶（喀斯特地貌）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61.9%，山、水、洞争相媲美，景色奇丽，不仅具有公园省之称，还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水能资源和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已发现 110 余种，内有 43 种居全国前十位；野生植物 3800 多种，野生动物 910 多种；丰富的森林资源被誉为“绿色宝库”；水能资源蕴藏量达 1874.5 万千瓦，每平方千米土地拥有的水能资源蕴藏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9 倍，全国平均



水平的 1.5 倍；贵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光照适度，无霜期长，既给人类和动物提供了良好生存环境，又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贵州尽管山高谷深，但水、陆、空交通形成网络，黔桂、川黔、湘黔、贵昆 4 条铁路干线呈十字交汇于省会林城贵阳，成为祖国西南交通的枢纽。以贵阳为中心的高等级公路网分别通往各市、州（地）及邻近各省。

## （二）贵州历史沿革

贵州约在 24 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居住，已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址 50 多处。“黔西观音洞”被考古学家列为与“北京周口店”、“山西西侯度”分别代表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种文化类型。

春秋以前，贵州属于“荆楚”或称“南蛮”之一部。春秋时代，境内部族林立。著名的有牂牁国，其政治中心称夜郎邑，辖境有今贵州乌江以南地区和云南、广西部分地区。在今贵州北部地区还有鳖国、繆国等。春秋末期，牂牁国没落，夜郎国兴起。战国时期至西汉初年，夜郎是西南夷各部落中最强大的地方政权，控制的地域包括今贵州的大部和四川、云南、湖南、广西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故《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为大。”公元前 135 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夜郎同意在其属地设立郡县。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派军队征服西南夷，夜郎侯受封为夜郎国王，保持夜郎国号和小片领土，在夜郎国中形成郡、国并存的